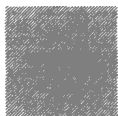


第一卷

大跃进与反冒进



经济发展要高速度

1957年11月18日 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 毛泽东郑重地表示 在15年以后 在我们阵营中间 苏联超过美国 中国超过英国。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毛泽东批示道 应当把一号博士的头衔赠给发明“跃进”一词的科学家。农业大跃进 水稻、小麦大放卫星，《人民日报》誓言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少产 有人发出了“粮食多了怎么办”的疑问；工业大跃进，1958年钢产量的指标一变再变 毛泽东说 比去年翻一番可不可以 于是 钢铁元帅升帐 书记挂帅 土洋结合 全民上阵 为1070万吨钢而奋斗 生产大跃进 生产组织也紧跟其后 人民公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徐水县甚至宣布进入共产主义。

大跃进没有达到预期的后果 是大跃进还是反冒进 庐山会议上党内就确定怎样的发展速度展开了大辩论，彭德怀疾言要毛泽东脱裤子 又上书毛泽东力陈己见。毛泽东认为劲可鼓不可泄 庐山会议由纠“左”变为反右 彭德怀成了反党集团的头目。大跃进仍在继续。

15年后，苏联超过美国 中国超过英国

1957年，毛泽东对中国的建设事业和内外环境忧心忡忡：花园里的毒草比香花多 不能谴责波兰人民的起义 对待斯大林问题

要保持平衡。然而，毛泽东认为，来自匈牙利的警报是不能忘记的，他必须从全国已存在的对他的个人崇拜的边缘慢慢地往后退，必须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推进中国的经济。

毛泽东的压力是很大的。他既想在这许多问题上进行公开的辩论，并且他也为之作了一些准备工作，但匈牙利的情况使毛泽东对党外的批评能走多远没有很大把握。

起初毛泽东对匈牙利人的造反是不那么反对的。他在一次有关处理矛盾的讲话中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毛泽东认为，匈牙利事件在匈牙利可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中国则几乎不可能。然而，匈牙利事件毕竟震动了毛泽东，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存在的。

在国内，毛泽东提醒右派分子迷途知返。他甚至称在武汉搞学生运动的人是“小纳吉分子”。在国际上，毛泽东支持了莫斯科在布达佩斯的新监护人卡达尔。1957年，卡达尔两次到北京，毛泽东都进行了盛情接待。

1957年国内是很团结的，由于1956年‘冒进’政策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其他领导人反对冒进，主张综合平衡政策取得的成绩，使毛泽东胸怀大度地退了一步，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但是，打破斯大林神话的毛泽东后退得并不充分，他内心要走一条中国式的道路。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苏联参加莫斯科会议。这是毛泽东一生参加过的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的国际会议。

据李银桥回忆：开始，毛泽东本不想去参加这次会议。那天在汽车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来电报了，约请主席去莫斯科。”

毛泽东听了，没有作声。

周恩来劝道：“你是党魁嘛 还得去。”接着 周恩来又告诉毛泽东：“铁托也要到莫斯科参加会议。”

“那就定下来吧？”

“好。”

毛泽东乘坐的图 104 客机经过 8 小时飞行，到达莫斯科。在机场迎接的赫鲁晓夫与毛泽东亲切拥抱。

“感谢你能够来参加莫斯科会议。”

“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 各国共产党应该互相通气 重新肯定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

“你说得很对。”赫鲁晓夫表示赞同。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一下飞机就对苏联进行了赞扬 这无疑对赫鲁晓夫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早在 1957 年 5 月 赫鲁晓夫就号召 在不久的将来 最迟在 1961 年之前 在肉、黄油和牛奶的人均产量方面追上美国 赫鲁晓夫嘲笑那些谨慎的苏联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对依靠若干集体农庄的这些产品的惊人增加来达到这个目标表示怀疑，赫鲁晓夫说：“所有这些怎么能用数字计算呢 这是个政治奇迹。”

11 月 6 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所作的重要讲话中说：

“同志们 我们的计划工作人员的计算表明 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 苏维埃国家在今后 15 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

这里所说的重要产品指的是 铁矿石、生铁、钢、煤、石油、电力、水泥 以及诸如糖、毛纺织品和皮鞋之类的消费品。

14 日至 16 日 在莫斯科举行了 12 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16 日至 19 日 又举行了 64 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

赫鲁晓夫 15 年超过美国的讲话，给各国共产党人和工人党很

大鼓舞。

苏联老大哥又前进了，中国怎么办呢？

11月的莫斯科虽然寒冷异常，但毛泽东心里热腾腾的情绪很激昂。

11月18日，在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表示：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到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到4000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的时候，你们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是个小国。但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地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

毛泽东停了停，喝了一口水，继续讲下去：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以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以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以及英共总书记高兰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这样岂不超过了英国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设想：

归根到底，我们应当争取15年的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仗了，世界也就得到永久的和平了。

毛泽东在大会上宣称，15年赶超英国，是否毫无准备？

其实，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共和国主席，在第一个

五年计划期间，就开始设想中国如何赶超美国的问题。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过程作过粗略的设想。他计划大约50-70年左右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和超过美国，设想50年以后出现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

1957年7月，毛泽东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写道：

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的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五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由于苏联提出15年内赶超美国后，毛泽东受到启发，改变了原来设想，提出中国要在15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行动口号。

毛泽东在提出15年赶超英国口号以前，事先征得了在北京的中央领导人的同意。

毛泽东在莫斯科谈了和平与战争问题的见解。

毛泽东说：“现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更强些？算一下吧。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有多少钢？苏联有多少钢？”毛泽东继续说：“但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现在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美国虽然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毛泽东分析完力量对比后，用高亢激昂的声音谈现在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著名口号传遍世界。

11月20日，代表团回到了北京。15年赶超英国的口号也随即得到了公开宣布。

12月2日，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这时，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还不到两周时间，与毛泽东交换过意见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到会致祝词。他说：

“我们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十年到十五年内的基本任

务 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 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 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他又说：

“ 在 15 年以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者超过美国 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期间 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

5 天以后，国家计划的主要制定者李富春在向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新目标。李富春预测，在 15 年结束时，中国的钢产量将达到 4000 万吨 而且他确信 英国将不可能达到这个数字。他自信地表示，15 年内 中国在煤、金属切削机床、水泥和化肥等方面的产量也将超过英国。

舆论界也开始行动起来。1958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乘风破浪》 进一步向全国人民宣传了 15 年左右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

赶超英国，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令人鼓舞的口号和目标！

15 年赶超英国，就等于中国只用 23 年的时间完成英国 100 多年走过的路。

100 年前，英国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华帝国的国门，中国人遭遇了一个多世纪的屈辱和苦难。赶超英国，是渴望富强的中国人民多么向往的事啊！

赶超英国的口号提出后 在实际工作中 各地区、各部门开始了对于过高指标的制定工作。

赶超英国揭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大跃进的车轮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运转起来 狂热的人民在其后的跃进进程中 将极大的热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于遍及全国的运动中。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飘扬在田野里的有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是怎样形成的，历来为人们所关注。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里论述了总路线形成的过程。

“由于我们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所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不能不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的问题，在一九五八年正式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词是在两种建设速度问题的争论中出现的。据薄一波回忆：

“多快好省”是毛泽东在 1955 年 10 月 11 日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结论中提出的。12 月 6 日，毛泽东又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久，毛泽东又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又加上了一个“省”字。12 月 14 日，薄一波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首次传达了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社论中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自己的事业”，从而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发表。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最早出现在 1958 年 1 月 1 日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上。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1958 年 2 月 3 日，《人民日报》发表《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称“让我们全党同志和所有革命志士，和人民群众一起，鼓起干劲，打破一切右倾保

守思想 力争上游 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吧！毛泽东把‘鼓起’改为‘鼓足’重新归纳 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提出。他说‘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 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 比‘鼓起’好 真理有量的问题 因为干劲早鼓起来了，问题是足不足。

在 1958 年 3 月 8 日至 26 日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两条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会后 中央将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发给会议的参加者。陈伯达将第一页上的“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句 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 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毛泽东将其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 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鼓足干劲 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

1958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工作报告》对总路线进行了系统概述 把总路线的基本点概括为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 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 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 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 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 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 通过这些 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5 月 8 日、17 日、18 日、20 日、23 日，毛泽东在会上就总路线的有关内容 作了讲话。

与会代表对刘少奇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作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绝大多数代表对总路线表示拥护。

5月23日，会议作出《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指出：“会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号召全党同心同德，团结全国人民，在继续完成整风运动的基础上，贯彻执行这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继续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积极地进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争取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为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从此，全国人民掀起了宣传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热潮。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认为“这次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结果。”在党的路线已经确定以后，全党的任务，全国人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这条路线，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

大跃进口号的提出

大跃进的发动是从农业开始的。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则是1957年9月、10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全会以批评“反冒进”而奠定了大跃进的思想基础，通过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简称为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同时在征求与会人员的意见后，中央作出了《关于在今冬明

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四十条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这样四十条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而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毛泽东对于“大跃进”一词采取何种态度呢?

据李银桥回忆: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在颐年堂接待客人,谈话结束后客人都走了。毛泽东从颐年堂出来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人同毛泽东一道走着。这位中央负责人与毛泽东边走边谈论着形势和工作,大家都憧憬着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那位负责人说:“主席,现在谭震林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毛泽东琢磨着。

“《人民日报》上登了。”

“嗯,这个提法很好,拿来给我看看。”

那位负责人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说:“嗯,这个提法很好。”他拿起笔,在上面批了话。记得大意是:提法很好。

李银桥说报纸很可能是《人民日报》。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指出:“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篇社论第一次使用了“大跃进”一词。毛泽东对此非常欣赏,他称赞说:“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取代了反冒进的口号。在对社

论的批语中，毛泽东还饶为风趣地批道：“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农业“大跃进”的号角吹响后，很快在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1957年10月，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达两三千万之多，以后又急速增长，11月份六七千万，12月份八千万，1958年1月达到一亿。

在水利建设高潮中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提前实现四十条，于是产生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简称六十条）草案规定：“在今后五年内或者六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八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在南宁会议以前安徽省曾提出三年改变面貌，毛泽东接受安徽省委负责人的建议，在《六十条》中规定：“十年取决于前三年，争取在三年内大部分地区的容貌基本改观。”并提出了“苦战三年”的口号。农业部长廖鲁言曾提出“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毛泽东抓住了这两句话，又补充了一句“每年看前冬”。

南宁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大家的头脑都热起来了。薄一波向毛泽东建议搞两本帐，中央一本帐，地方一本帐。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经过讨论研究变成了三本帐。《六十条》中的第9条讲道：“生产计划三本帐。中央两本帐，一本是必成的计划，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计划，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两本帐。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这在地方上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评比以中央的第二本帐为标准。”两本帐、三本帐的观念为计划的层层加码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缺口。中央带头搞两本帐，地方各级也纷纷仿效，搞自己的两本帐，下到基层，同一个指示，却有了六七本帐。不管工业、农业，其他行业，通过编两本帐的方法，“大跃进”的各种指标，层级拔高，甚至到了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程度。

南宁会议确定了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3920亿斤，增长5.

9% 棉花 3500 万担 增长 6.7%。到了 3 月成都会议 指标又作了大幅度提高，把南宁会议和一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 1958 年指标，作为中央的第一本帐，另搞了一个高指标的第二本帐，规定 1958 年粮食达到 4316 亿斤 增长 16.6% 棉花 4093 万担 增长 24.8%。到 6 月中旬八大二次会议结束后，农业部向中央政治局作出二五期间农业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报告，居然异想天开地提出了 1962 年粮棉指标的第二本帐：粮食 8500 亿斤 棉花 8000 万担，即粮棉产量在 5 年内都翻一番，完全陷入了空想。

全国争放大卫星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党中央要求如此之急，期望如此之高，下面当然不能让上级扫兴。于是在高指标和层层批右倾保守的压力下，很快出现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1958 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以严重的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

早在 1958 年 1 月 3 日 汕头就报出晚稻亩产 3000 斤的消息。2 月 23 日 贵州金沙又异彩纷呈 报出了 3025 斤的记录。入夏以后 各地出现了竞相‘放卫星’的浮夸风。

“放卫星”一词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因为前苏联此前曾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 人们就把自己假造的所谓高产典型美其名曰‘放卫星’，一时间成为全国流行的时髦用语。

6 月 8 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 5 亩小麦亩产 2105 斤的记录。随后各地竞相放出了小麦亩产的“卫星”：6 月 9 日 湖北襄阳 大面积亩产 1500-2000 斤；6 月 11 日 河北魏县 2394 斤；6 月 16 日 湖北谷城 4353 斤；6 月 16 日 河北临漳，3650 斤；6 月 16 日 湖北先化 3664 斤；6 月 18 日 河南商丘 4412 斤；6 月 21 日 河南辉县 4535 斤；6 月 23 日 湖北谷城 4689 斤；

月 30 日，河北安国县 5103 斤；7 月 12 日，河南西平县 7320 斤。小麦亩产‘卫星’最高的是 9 月 22 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塞什克农场亩产 8585 斤。

小麦亩产‘放卫星’水稻亩产也‘放卫星’。6 月 26 日起又连续出现了一批虚夸的早稻亩产量：6 月 26 日，江西省贵溪县，2340 斤；7 月 9 日福建省连板社超过 3000 斤；8 月 1 日湖北省孝感县，15000 斤；8 月 13 日湖北省麻城县，36900 多斤。水稻亩产‘卫星’最高的为《人民日报》9 月 18 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 130434 斤。

“卫星”上天使一些人本来就不冷静的头脑更加升温了。从 6 月中旬开始，刚成立的各大协作区先后召开农业协作会议。由柯庆施任主任的华东协作区首先放炮：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去年粮食总产 715 亿斤，今年夏季就收了 203 亿斤，加上秋季将有 1200 亿斤比去年净增 507 亿斤增长近 70%。谭震林则在会议总结中说，一般规律农业只能增长 4%、5% 最多 6%，一般的跳跃可达 10%、20% 华东今年增长 70% 这是飞跃。据此，他认为原来估计今年全国增产 1000 亿斤，就小得不像样子了。

广东省则宣布春收和早造粮食增产 65 亿斤，比上年增加 60%。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还著文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者”说本省 1 年可以种 3 造亩产 1 万斤应当是可能的。

7 月 23 日农业部发表夏收粮食公报说夏粮比上年增产 413 亿斤增长 69%。8 月 25 日，农业部党组在提供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称，1958 年全年粮食总产量超过 8000 亿斤比 1957 年的 3700 亿斤增加 4000 多亿斤增长了 1 倍以上。北戴河会议对此数字有所保留在 9 月 1 日发表的会议公报上宣布 1958 年粮食产量将达到 6000 亿——7000 亿斤比上年增长 60%——90% 棉花产量达 7000 万担，比上年增长一倍以上。

新华社女记者制造了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少产的典型

报纸宣传也失去了常识。7月2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今年夏季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宣称：中国农业发展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粮食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8月3日、8月13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均正面引用了“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少产”的“豪言壮语”。8月27日《人民日报》竟然用通栏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少产”。这些文章或者称“地的产是人的产决定了的”，或者称“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的我们都做到了”，达到了极其离奇乃至荒谬的地步。

那么 这些“卫星”是怎样上天的呢？

大多数丰产典型是采取“并田”的方法，即把许多块成熟的庄稼移到一块地里，从而出现了高产；也有的是按照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如山东寿张县推算，一亩谷子密植四五十万株，一棵谷穗一两谷，一亩就是3万斤。对此“卫星”上级领导和新闻单位居然深信不疑。

让我们看一看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卫星”的情况吧！

1958年5月，中共遂平县委对嵯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麦收十分重视。县委副书记赵光专程到嵯岈山，先找公社社长钟青德，问：“有没有亩产千斤以上的高额丰产田？”

“有哇！有的试验点就有！”

赵光大喜，随即就和钟青德往他的试验点韩楼大队奔去。

大队长陈世俊低声对支部书记曹玉娥说：“赵书记想在咱这儿放卫星哩！”

曹玉娥有点担心，说：“咱这麦，也打得差不多了，就只有村北20亩试验田的麦子没打，亩产多说也只有三、四百斤。”

陈世俊说：“那书记想放卫星哩，咱不放会中，可以把面积少说一点。”

两人一商量，一个决定产生了，他们去向赵光和钟青德汇报。

“今年村北试验田的 29 亩麦子长得最好，产量准在千斤以上。”

“真的？”赵光一阵惊喜。

赵光把这一消息立刻通知了新华社河南分社女记者方簧，请她到嵯峨山总结小麦试验田的高产经验。

打麦时，由公社副书记陈世伦、银宗武和郑州赶来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方簧等人监打过秤。结果，2.9 亩总产 10210.9 斤，亩产 3521 斤。一颗“卫星”升上了天空。

后来遂平县豫剧团以曹玉娥为剧中主要人物编写了一个名叫《中国的卫星上了天》的剧本，几句唱词风传一时：

嵯峨山 八宝山，
小麦亩产在千八百三。
中国的卫星上了天，
江北变江南。

1958 年 10 月，在西安召开了九个省市农业协作会议。会议提出，1959 年全国粮食产量 15000 亿斤必须保证，并力争达到 2 万亿斤。会上还有一种奇异的说法：中国粮食产量再提高，“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来也够用。”

“大跃进”一跃千里，日新月异，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8 月初，他以极其兴奋的心情对来访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1949 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